

陕西非遗文化外宣翻译的生态适应性阐释

王翠英

咸阳师范学院, 陕西咸阳, 712000;

摘要: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“适应与选择”理论为基础, 探讨陕西非遗文化外宣翻译的生态适应性。陕西拥有 5 项人类非遗、9 项国家级非遗及 766 项省级非遗, 其翻译生态环境具“层级性”“地域性”“多元性”特征。文章分析非遗外宣翻译面临的三大生态挑战: 文化差异导致的认知偏差、思维障碍与冲突, 语言结构在词汇、语法、表达方式上的壁垒, 以及译者在语言能力、文化素养、跨文化交际能力上的不足。同时, 结合“三维适应选择”理论, 阐述生态适应性在语言维度(词汇适配、语法调整、表达优化)、文化维度(符号转换、内涵融合、习俗还原)、交际维度(受众调整、媒介适配、反馈优化)的具体体现, 为陕西非遗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。

关键词: 陕西非遗; 外宣翻译; 生态翻译学; 适应性选择; 文化传播

DOI: 10. 64216/3080-1516. 25. 06. 058

1 生态适应性理论

生态翻译学(Eco-translatology)是 21 世纪初由中国学者胡庚申教授提出的新兴翻译理论, 其核心是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“适应与选择”原理引入翻译研究, 将翻译活动视为一个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的、动态的、相互关联的“翻译生态系统”。该理论的提出, 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译者、源语、目标语、文化环境、传播媒介等多个要素的互动关系中,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“生态视角”。

2 陕西非遗外宣翻译的生态环境特征

陕西非遗翻译生态环境具有鲜明的“层级性”“地域性”“多元性”特征, 这三大特征共同决定了非遗外宣翻译需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。

从“层级性”来看, 不同级别非遗在文化定位与传播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, 需匹配差异化翻译策略。人类非遗代表作翻译需在保留本土文化标识(如“茯茶”音译“Fucha”)的同时, 融入全球受众可理解的文化参照, 增强国际认可度。

“地域性”。陕西地域文化呈现“关中、陕北、陕南”三大板块的差异化格局, 非遗文化深度根植于当地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, 翻译时需精准捕捉地域特色。以“春节”习俗为例, 陕西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特色: 关中地区讲究“贴春联、吃臊子面、逛大唐不夜城庙会”, 陕北地区有“扭秧歌、剪窗花”的习俗, 陕南地区则保留“蒸年馍、祭灶神”的传统, 翻译时需在“春节”这一通用文化符号下, 补充地域特色表述, 如“Spring Festival in northern Shaanxi: Yangko Dance and

Paper-cutting” “Spring Festival in southern Shaanxi: Steaming New Year's Steamed Buns and Kitchen God Worship”, 避免地域文化信息流失。

“多元性”则体现在不同类型非遗的文化载体与表达逻辑差异显著, 翻译需适配其独特的文化属性。如将西安鼓乐的“坐乐”译为“stationary ensemble”(而非直译“sitting music”), 契合音乐类文本的表达习惯; 传统技艺类非遗如咸阳茯茶制作技艺, 关键在于“工艺流程与技术特征的准确传递”, 翻译需使用专业术语并补充工艺细节, 如“渥堆发酵”译为“pile fermentation”(符合茶叶加工术语); 民俗活动类非遗如宝鸡社火, 重点在于“文化场景与情感内涵的传递”, 翻译需结合生活场景, 采用“描述+注释”的方式, 如“宝鸡社火”译为“Baoji Shehuo Folk Parade (a traditional activity during Spring Festival where people dress in costumes and perform to pray for good harvest and prosperity)”, 帮助受众理解非遗的文化功能与情感价值。

3 非遗文化外宣翻译面临的生态挑战

非遗文化外宣翻译所处的生态系统复杂且多元, 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差异、语言结构的本质区别、译者素养的不足等因素, 共同构成了翻译实践中的“生态挑战”, 这些挑战直接影响着非遗文化外宣的效果。

3.1 文化差异的鸿沟

当非遗文化通过外宣翻译进入目标语文化生态时, 文化差异便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“鸿沟”, 主要体现在

以下几个方面:

价值观差异导致的文化认知偏差。中国非遗文化中蕴含着浓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伦理观念,例如,陕西“春节”习俗中“阖家吃臊子面”体现了家庭本位的价值取向,“贴春联”习俗体现了辞旧迎新的集体心理;而西方文化则更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,注重个人的独立与自由。这种价值观的差异,容易导致目标语受众对非遗文化的误解。

思维方式差异导致的文化解读障碍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“整体思维”与“形象思维”,非遗文化的表达往往具有“含蓄性”与“象征性”;而西方文化注重“逻辑思维”与“理性思维”,更倾向于直白、清晰的表达。以陕西剪纸“立春剪牛”为例,其设计基于整体思维体现农耕文化内涵,“牛”象征生机与丰收,并无对应的西方文化符号;若在翻译中直接将“立春剪牛”译为“Paper-cut of Ox for Start of Spring”,而不加以解释,译文受众可能会将其与普通动物剪纸混淆,无法理解背后的农耕文化寓意,进而对陕西剪纸文化产生质疑。

3.2 语言结构的壁垒

汉语与英语作为非遗外宣翻译中最常用的两种语言,其词汇、语法、表达方式等结构差异尤为显著,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词汇层面的“文化空缺”。非遗文化中存在大量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“文化专有词”,这些词汇在目标语中往往没有对应的词汇,形成“词汇空缺”。例如,西安鼓乐中的“坐乐”“行乐”,咸阳茯茶制作技艺中的“渥堆发酵”“发花”,陕西民俗中的“社火”“面花”等,这些词汇所代表的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,若仅采用直译或音译,往往无法让目标语受众理解其含义。

语法层面的“意合与形合”差异。汉语是“意合型”语言,句子结构主要依靠语义逻辑连接;而英语是“形合型”语言,句子结构依靠语法形式(如关联词、时态、语态等)连接。这种差异在非遗外宣翻译中容易导致译文“不符合目标语语法习惯”的问题。例如,在介绍安塞腰鼓时,汉语表达为“安塞腰鼓,陕北民间舞蹈,节奏刚劲,体现当地人民豪放精神”,句子之间依靠语义逻辑连接;可译为“Ansai Waist Drum is a folk dance in northern Shaanxi, characterized by vigorous rhythm and reflecting the bold spirit of the local people”,通过增加系动词“is”与关联词“and”,

使译文符合英语的形合要求。

表达方式的“具象与抽象”差异。汉语在表达非遗文化时,往往注重“具象化”与“情感化”,善于运用比喻、象征等修辞手法;而英语则更注重“抽象化”与“理性化”,表达方式相对直白。例如,在描述富平陶艺时,汉语常说“形如玉、亮如漆、声如磬”,通过三个具象的比喻展现陶艺的特点;若直译为“shape as jade, shine as lacquer, sound as chime”,虽然保留了比喻,但西方受众可能无法理解“玉”“磬”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(“玉”代表纯洁、高贵,“磬”代表清雅、庄重),从而无法体会到陶艺的文化价值。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,容易导致非遗文化的“情感内涵”在翻译中丢失,影响受众的情感共鸣。

3.3 译者素养的考验

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,译者是翻译生态系统的“核心主体”,译者的素养直接决定了翻译的“生态适应性”——即译文能否在目标语生态环境中“存活”与“传播”。然而,当前非遗文化外宣翻译领域,译者素养的不足已成为制约翻译质量的关键因素,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
语言能力的“单一化”。非遗外宣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备扎实的源语与目标语语言功底,还需熟悉非遗文化相关的“专业术语”。例如,在翻译华县皮影戏术语“碗碗腔”时,若译者不了解皮影戏专业知识,可能会直译为“bowl tune”,导致完全的误解;正确的译法应为“Wanwan Tune (a melodic style of Shaanxi shadow puppet theater)”,既保留了音译,又体现了专业性。

文化素养的“片面化”。非遗外宣翻译要求译者具备“双文化素养”——既深入理解源语非遗文化的核心内涵,又熟悉目标语文化的认知习惯与接受心理。例如,在翻译咸阳茯茶制作技艺时,若译者不了解西方文化中对“微生物发酵食品”的认知,而简单译为“Xianyang Fucha production technique”,则可能让西方受众误以为这只是普通茶叶制作,而无法理解其“丝路贸易商品”“独特金花菌”的文化内涵;若译者了解西方文化中对“历史贸易商品”的兴趣,在译文中增加“a traditional craft with a long history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”的注释,则能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这一技艺的文化意义。

跨文化交际能力的“薄弱化”。非遗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“有效交际”,即让目标语受众理解并接受非遗文化,而跨文化交际能力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。

键。但当前许多译者仅关注“文本翻译”，忽视了“受众需求”与“传播效果”，导致译文“水土不服”。

4 生态适应性在非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体现

根据生态翻译学的“三维适应选择”理论，非遗文化外宣翻译的生态适应性主要体现在语言维度、文化维度与交际维度的适应与选择上。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、相互影响，共同构成了非遗外宣翻译的“生态适应体系”，确保非遗文化能够在目标语生态环境中有效传播。

4.1 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

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是非遗外宣翻译的“基础”，其核心是译者根据目标语的语言习惯（词汇、语法、表达方式），对源语文本进行调整与优化，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语言生态，避免出现“语言不通”或“表达生硬”的问题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是词汇层面的“适配性选择”。针对非遗文化中“文化专有词”的“词汇空缺”问题，译者需根据目标语的词汇生态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（如音译、意译、音译+意译、加注等），确保译文既能准确传递文化内涵，又能被目标语受众理解。例如，西安鼓乐中“坐乐”“行乐”，采用意译“stationary ensemble”“processional ensemble”；陕西剪纸“窗花”译为“window paper-cut”，“门神”译为“door-god paper-cut”；“碗碗腔”译为“Wanwan Tune”（音译）+“a melodic style of Shaanxi shadow puppet theater”（注释）；咸阳茯茶“渥堆发酵”译为“pile fermentation”；“大唐不夜城庙会”译为“Datang Never-Sleeping City Temple Fair”，宝鸡社火译为“Baoji Shehuo Folk Parade”；秦腔译为“Qin Opera”，安康道情译为“Ankang Daoqing Ballad”。

二是语法层面的“协调性调整”。针对汉语与目标语（如英语）在“意合与形合”上的差异，译者需根据目标语的语法规则，对源语文本的句子结构进行“协调性调整”，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。例如，介绍安塞腰鼓时，需调整为“Ansai Waist Drum, a traditional folk dance in northern Shaanxi, is characterized by vigorous drumbeats and dynamic movements, reflecting the bold spirit of the local people”，通过“a traditional folk dance...”补充属性，“is characterized by...”明确谓语，使译文符合英语语法生态。

三是表达方式层面的“转换性优化”。针对汉语“具象化”与英语“抽象化”的表达差异，译者需进行“转换性优化”，在保留非遗文化情感内涵的同时，让译文更贴合目标语受众的认知习惯。例如，描述商洛花鼓时，汉语常用“婉转悠扬”“热闹欢快”等具象化词汇，可译为“Shangluo Flower Drum, a folk song and dance from southern Shaanxi, features melodious tunes and lively rhythms”，通过“features melodious tunes and lively rhythms”概括特点，符合英语表达方式，保留艺术感染力。

4.2 文化维度的转换融合

文化维度的转换融合是非遗外宣翻译的“核心”，其关键在于译者需在源语非遗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找到“平衡点”，通过文化转换与融合，避免文化冲突，让目标语受众理解并接纳非遗文化的核心内涵。

4.3 交际维度的有效达成

交际维度的有效达成是非遗外宣翻译的“目标”，其核心是译者需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与传播场景，调整翻译策略，确保译文能够实现“有效传播”——即让目标语受众理解、接受并主动传播非遗文化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胡庚申. 生态翻译学：建构与诠释[M]. 北京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13.
- [2]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,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.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民俗文化英译[M]. 苏蕊, 译. 西安：西北大学出版社, 2021.
- [3] 田亚亚, 杨娇, 廉洁.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（汉英对照）[M]. 西安：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22.
- [4] 洪莉. 生态平衡视角下的中国非遗外宣翻译[J].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19, (03): 119-122.
- [5] 谷旭光, 李辉, 崔丽.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综述[J].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21, 21(03): 98-105.

作者简介：王翠英（1980.05—），女，汉族，黑龙江齐齐哈尔人，博士，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：翻译理论与实践。

课题项目：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，项目名称：陕西汉画像石英语译介研究，项目编号：2025HZ0711。